

地北天南

叙

古今

以‘大历史’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广受海内外瞩目者，于本书中仍然一秉其令人惊叹不置的才华，生动地描绘了他生涯中的逆旅履痕，月旦人物。出入古今，疑似没有章法，却又恍若无数大手笔的绘卷，历历如在目前……



黄仁宇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地北天南叙古今

黄仁宇◎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地北天南叙古今

著者	黄仁宇
责任编辑	姚军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开印字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
刷本	850×1168毫米 1/32
张数	9.5
	250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06-668-1/R·19

定价：19.80元

玉 垒 浮 云

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这本集子收录了我过去曾在各处发表过的二十六篇文字。最早的刊于一九四四年，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最迟的则出版不久，仿如昨日。虽说当中有些文字带着旅游性质，有的则暴露着个人经历，全书的范围可以概说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之耳闻目见与脑内的构思。积之则提供了他的历史观之侧面背景。正因为其不拘形式可以补助有体系的文章之不足；也因为全书缺乏长篇大论，读者也可信手翻来，随时释卷。

只因为不能令一部书完全漫无头绪，与编辑先生小姐们商量之后，将这二十六篇归纳为五类，分别为“缅甸战场的闻见”，“五十年来的抚今追昔”，“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实用”，“欧游观感”和“古今人物”。只是这样的分类仍不能全部囊括各篇的内容，也无从避免彼此间的重叠，所以又各用唐诗两句为题。诗歌的好处则是放漫不拘形迹，有时则又辞句隐蓄，不全受一般修辞学的限制。

我想读者具有同感：我们今日已面临着历史上一前所未有的局面。只举着近身一例：自从一九四五年内战之展开，已使近两百万的军民，于极短期间自大陆移居于台湾。这即已是中国历史里自洪荒以来未有的事迹。因为如此，再加以很多类是打破纪录的变故，使我们过去用以衡量历史的尺度至此大体失去效用。再瞻望着最近台湾海峡两岸人事的转变，也使我们领悟到内战之

真意义并不是所谓无产阶级清算有产阶级，而是中国需要彻底改组迎合全世界潮流所带来之不得已的动乱。其中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要剔除农村里阻挡着全面改革的各种障碍，所以为患至烈。台湾这方面倒可以因利就便，只引用了一九五三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再配合美援，即先期完成了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能迅速的存积资本，发生了领导的作用，这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眼看清。也因为如是，当日各方面依据意识形态所写的历史也因为时过境迁，今日都及待修订。

有了这半个世纪的动乱，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之发展如仅以各人的人身经营评判，有时也确是惨酷少恩。中国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有亦不为桀纣而亡”的说法也能在很多的场合上适用。可是在长期间里引用着超过人身经验的眼光看来，历史之行进却不可能全部出诸偶然，到头也仍具备它的合理性。此中的关键在我看来即是黑格尔和卢梭所说“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一观念之不可磨灭。

大凡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遇到社会环境剧烈的变化，承受着内外空前压力之际，人民挺而走险，在此时发生战争与暴动，初看起来，必是激情多于理智。一到事后，有了前后史迹之纵深，则使我们了解当日牺牲了十万和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尤其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的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使此局面与我们个人的志趣和期望相违，我们也应当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虚心考究其积极性格。

中国历史里虽然没有与刻下完全相同的前例，可是经过长期大幅度变动之后重新创造帝国的事迹却也有好多起，当中以秦汉帝国崩溃之后通过魏普南北朝之一段分裂的局面至隋唐之勃兴的

例子最为显著。当日法制简单，中枢的存在全靠能向全民直接的抽税。思想上的统治则依赖于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学说以儒家、法家、阴阳家利于中央集权的教条混合一起解释而为自然法规（naturallaw），再加以东汉以来注重星象图识等神秘力量作行政的支撑。一到公元三世纪“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亦即是将小自耕农兼并，将以前向政府当兵纳税的人收束为奴，并为“部曲”，中央政府一筹莫展。一到内忧外患兴起，各大姓更巩固“坞”自卫，有了私人军事力量的根据。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失去了凭借，此期间道家和佛教思想风靡一时，也不过在注重各个人之超脱，中国缺乏有体系的组织逾三个半世纪。

我们再翻阅重新建造新帝国的程序，其历时之久费功之多，远超过以前的想像。最初主持重新统一之工作者不为李唐王朝，也不是杨隋王朝，而是北魏拓跋氏，亦即迄至公元三世纪汉亡时仍无文字无居室的游牧民族。从本书“崔浩”一篇也可以看出，当日拓跋民族利用了他们人文单简的长处，在初期汉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政策，将其他游牧民族强迫的改业为农民，构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新国家，不到羽翼丰满不问鼎中原。有了这种基本的工作，政府才能确切的掌握到全民，以后纵再度经过分裂与合并，汉化与反对汉化的各种阶段也透过了北齐与北周，仍然由于这小自耕农为主的体系才能奠定了隋唐大帝国全体人民当兵纳税的基础。以后的租庸调制、府兵制、律令格式等等系列无不倚靠这下面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为基础。这样一来，新帝国近乎人工孵育而成。所有高层机构、低层机构及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全未得到由刘汉王朝遗传过来的好处。这种亘世纪超过人身经验，也透过朝代的筹划，除非我们相信冥冥之中确有天神作主，只能称之为公共意志之所获得的成果。即像崔浩本人死于非命，在历史家的笔下也只成为了一个三等角色，却已在言行之

间表示着这样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读者还没有想到，今日之中国不论是在大陆或是在台湾，也是由重新创造而产生。彼此得自满清的都至少。不仅在法律、军制、财政、税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与前朝缺乏联系性；又纵算在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调，这样的价值至今已只能作为私人操守之南针，已不复为组织国家与社会之纲领。如果本世纪的初年中国还是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迄至世纪之末已是“十年之后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以前全靠宗族邻里乡绅保甲以传统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国则已进入一个带高度竞争性的世界里，以国民经济的活力为衡量国运盛衰的尺度。以当中几十年内变化之大则可以想见改革过程中动乱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余年内，我已经在各处用中英文发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著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要是其间功绩不归于各个人，至少要归于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这种说法不因两年前北京天安门所发生的惨剧而动摇。其所以如此，也还是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这种说法时，我当然知道我没有实切的证据为凭借。即以上诸人尚且曾未以上述的行动作为他们自己一生事业之总汇。那我岂不是替人作义务宣传而冒犯着一个平白招讨没趣的可能？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申明：现代历史家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褒贬”。除了一些考据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证据。最重要的，他应能将已经发生的事迹，面对着现状，解释得两头合理

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应当争取主动。因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争取历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国历史里尚乏成例，在欧洲初期的现代史里却有不少类似的事绩，此间已不及一一叙及。总之则我多年的著作大都与这主题有关，当中一定有局部的错误，也容以后发现更正。这一体系之理论能够与读者见面则是每一册书内都能保持其前后之联系，各书间也能保持彼此之联系。换言之，我的“证据”即是在某种范围之内古今中外的事迹都可以穷极其因果关系，解释得合理化，也与刻下所述的改革衔接。计有：

- 《万历十五年》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一剖面，虽说所叙的为晚期，当中组织结构之纲领，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发展的要点从春秋战国叙至明朝的登场，可是也仍引用现今改革后之立场作基点回溯前去。所以在“开场白”里提及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中国历史“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各篇曾在《中国时报》刊载。
- 《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分述历史上其他国家作类似改革的程序，已在《历史月刊》连载，单行本筹备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 《放宽历史的视界》大致以论文的方式从明清叙述到现今改革之前后。
- 《中国的大历史》将以上各书内容按时间的顺序综合。也加强了明清及民国初年的叙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学者已由《历史月刊》及《民生报》连载。单行本预计明年成书。
- 以上《万历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陆出的简体

文字。《大历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筹备中，《放宽视界》之一部已曾之英译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赫逊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陆版本。

本书也可以说是在正式论文之外提供了参考的线索。我认为读者需要了解中国在二十世纪的长期革命时，不要忽视十七世纪英国之经历的参考价值。这一点已由〈怎样读历史〉说明。即〈克仑威尔〉和〈霍布斯〉各篇也针对着当日英国发生的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出了可供参考之处。

书的〈重游剑桥〉，〈英伦鸿爪〉和〈母后伊莉莎白〉原应《中时晚报》时代副刊的邀约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现在看来，也仍离不开一个教学历史的人所留下来的观感。我和内子因往英国的次数较为频繁，逗留也较久，更因着语言的方便，就有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观察之机会，历来也钦慕这国家苦心孤诣的一意维持传统之性格。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来，此邦已愈像美国，伦敦也越像纽约。究其原因也仍是经济发展之所致。因之也回忆到一九七三年剑桥的人士辩论英国应否加入 EEC（欧洲共同市场）时邻居人士抗议着：“英国要给欧洲大陆吞并去了！”（England will be swall, owed up by Europe!）实际上现代经济愈展开，每个国家之独特形貌及作风必受国际间接触的关系而冲散减低，影响所及甚至以前之优雅恬静和社会上合法守礼的态度也可能随着而减退。这也可以看作过去英国人士坚持《光荣孤立》之一主因。反面看来，以前有这些优美的成份在，大体上也只有社会上一部分之人士才能欣赏，此因其带服务性质之事业尚未大规模的普及化，这样的事业只专重于质量而不及在数量上全面扩充之故。即此也可以想见其优美之代价大部由低层阶级单独的付出。更推而广之，中国近几十年来，过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制精神污染”的运动。何尝不与类似的矛盾有关，只是提

倡的人愈将实际的问题解释得抽象化，愈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愈走极端而已。

我们旅行于其他的国家也不自觉的在有些地方沾染着某些高级市民的观感（因为旅行时总是受人服侍）同时又感到通货膨胀的压迫。平心静气的想来，则领悟到现代经济之展开具有孟子所说“独乐乐不若与众”的逻辑在，总之即是无可抵挡。至此〈英伦鸿爪〉一篇也可以与书中〈摩天楼下的刍议〉同时看去。过了时的社会价值不复成为构成国家与社会的纲领，前已言之。可是我们也还是希望人类精神上和伦理上共通的长处仍能保留，作为一般人处世立世的南针。因为所说已逾越于历史的范围，故曰“刍议”。

普通我们对着历时已久，与个人的关系较稀之事物容易作斩钉截铁的论断，有时甚至可以在三言两语之间说得义无反顾。及至提及与我人实际接触的事物，则不容易于是的处置，有时即在下结论之际亦免不了一再踌躇。在这些地方虽长期学历史的人不能避免。既知道自己有些弱点，则只有心存警惕。写轻松而无一定格式的文章则有一种好处，可以使作者和读者同时理会到思潮的线索矛盾之所在。可是我发表这样的文字，当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劝说读者对我所说不不要过度认真。而是与读者共勉，接受历史之仲裁。因为我有了一段从中国社会里实地体验以后又在外彻底思索比较的机会，深切的感觉到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不仅不能因个人情绪上的反应而取决，多时尚超过小范围内我们自以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断。〈为什么威尼斯〉从长沙车站牵扯到缅甸丛林，又从威尼斯河上的红绿灯提及里昂教学的明烛，也是贯彻我历来的宗旨，将眼光放宽放大。有了大范围，长时间、远视界的历史眼光之后才敢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份子，不容再构成一种特权阶级。〈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

也保持类似的观点，其重点则在指出历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与“个人主义”有了很大的差别。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赫逊河畔纵谈主义〉同为应《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之邀约而作。我极为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发挥我对这问题的观点。我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不企图用商业管制的方法代替过去以农业作主的管制方式。这样的法制能够付诸实施要在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一经施行，则以私人资本为主体并且尽量保障其牟利的体制为资本主义，在内中渗入公众的资本，也借社会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产的体制则为社会主义，两者只有相对的不同，无实质上基本的差别。至于完全不承认私人财产的权利，虽称为共产主义，只有“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三种实用上的型式。第一种见于初民社会，第二种由私人团体组织，却始终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例子。第三种型式见于苏联及中国大陆，现在看来，也只是非常期间经济动员的一种办法，不能长远的立足，否则不会引用今日的经济改革。

所以我以一个学人的身份承认中共和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成就，却不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希望有朝一日中共放弃共产党的名目，接受客观的历史学之支持，减轻他们本身对意识形态的负担。

在我研究各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通常以其能进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为转换点。一般的在达到这局面之前，需经历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可是也有极少数的例外。一九九〇年我们参加李约瑟研究所的第六届中国科技史会议后，去挪威、瑞典、丹麦巡回一周。书中也有两篇文字，记述在斯堪底那维亚半岛所见之外，涉及这三国的历史，这三个国家能避免上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由于她们能够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够开发她们

的资源时与外间各国的经济配合，如丹麦之全面以畜牧业代替耕种，挪威之开发水电，瑞典之利用木材与铁砂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们更感到地缘政治的重要。至于斯堪底那维亚国家能如是，何以中东的国家有原油则不能如是，当中也值得考虑。又这两篇文字成稿之后，挪威极受人民爱戴的国王奥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继承，瑞典放弃了不参加国际组织之宗旨，申请有限度的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书中叙人物的两篇〈萨丹·海珊〉和〈沙卡洛夫〉可算与现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于我仍在不断探试将中国长期革命的史迹归纳为世界历史之一部的后果，既提及世界史，则不能只以西欧美国和日本的圈度为限。我希望读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识：彼此都相信今后很多待开发的国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对中国现代史所作结论之可能。这样的可能性对历史学家付以相当之压力，一方面强迫他们扩大视眼，立即仓皇对付在本人专长之外准备得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又觉得无可推诿。要是我们所讲所说，对当前世界上发生的大问题毫不相关，则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历史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所作〈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提及。

不过全书内一大部分，则是一方面参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个人亲身经验，说明中国利用抗战而构成新体制的高层机构之情形。举凡〈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忆田汉〉〈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关汉骞和他的部下〉、〈蒋介石〉和〈白修德〉各篇都有对这题目发挥之成份。其重点则是“无中生有”当日国军之军令、军政、军训、军需、军法全非旧式农业社会所能支持，当中种种捉襟见肘的情形，半世纪之前尚且不能公开道说，只是置身重庆、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贵州、和昆明的人士应当有切身的了解。今日这最基本的史实，也不容我们属于

左派或右派或前进或顽固可能倾倒或遮盖。当时很多人对国军的批判，大体忽视历史上之背景。刻下将这些详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过事非。只因为中国近代史里的积极性不予以表彰，所写出的“历史”只有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其实这并非历史，而系作者本人对历史狭隘之反应。

〈蒋介石〉一文刊出后，《人间副刊》接到读者梅寅生先生三月六日的来缄，刊载于三月九日之“读者来缄”，信中指出：

- 白修德等所著书 *Thunder Out of China* 应译为《中国的雷声》，作者译为《雷霆后之中国》殊舛原义。
- 文中提出六中全会受蒋委员长斥责之王姓委员为王昆仑，他所质问的对象为防守衡阳的方先觉，也有他质问之理由，作者所叙失之过简。
- “时间上之凑合”应称为“因果关系及时机”，因为 *timing* 通常为《时机的选择》，此字无“凑合”的意义。
- 尤特里所著书 *The Last Chance in China* 应译为《中国最后的角头》。
- 文中所述“毫不假借”文义欠妥，大概作者根据传统公文中“严究不贷”的字样将“贷”引伸而为“假借”。

因为我看到这“读者来缄”时，已有相当的时日，只能请副刊编辑将我的答复缄寄梅先生。现在此文既已收入专集，而提议应当改之字句又全未修改，应将理由条列于次：

白修德之书名无完全恰当的译法如全部按字义，即应为《雷霆出自中国》。可是这使读者不知所措。即提议的《中国的雷声》虽说较为适切，只是内中的“的”字和“声”字，也为原文所无。在这情形之下，译者应有相当之自由。此书结论中既提出中国重享和平时未来建设的景貌，则称“雷霆后”应不与原作者的创意冲突。

文中虽未指出王昆仑质问对象为方先觉，但已指出其范围有关国军军令。其实一九四五年当日我曾在重庆六中全会大会会场之停车场内即时听到两位出席的中委谈及质问和申斥的经过。方先觉在被俘逃回后谒见蒋委员长的谈话也由侍从室的一位朋友告知，据我所知，方称被俘由于援军之不能及时到达。其详情应已收入委员长之永久纪录。又委员长在申斥王昆仑之后仍在当晚派人向之道歉。只是目下发表的〈蒋介石〉一文系“赫逊河畔叙中外人物”专栏中之一篇，限五千字概括蒋总统一生的为人及在历史上的地位，即提到这段曲折亦只表现其极端容忍之余有时仍不能抑制其怒气，不能也无需注入当中细节。再则关于蒋与方先觉军长之一节先已在《历史月刊》一九八八年九月号提及，亦即此书中之〈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Timing 如由自己一身作主确有“选择”性质，有如日军 timed 星期日早晨美方防备松懈之际突袭珍珠港。但是出于一种机遇，即系两种事体在时间上的“凑合”，有如努尔哈赤之兴起 timed 在明朝财政感到困难之际。我用 timing 一字，通常只有后者的意义。这也是要在文内注入外文的由来。

尤特里所著书，我文内误作 China's Last Chance，趁着这机会修正。只是两者之区别，在一个机会之“在”中国或中国“之”机会，将机会改为“角头”无益于事。

“毫不假借”系“毫不通融假借”之意，与“借”“贷”无关。

总之，我笔下头绪纷纭，错误在所不免，也承望各界告知，以便次版改正，有如“万历十五年”的错误，即蒙吕士朋和陈万益两先生指正，至今感激不尽，可是另一方面则任何著书人都希望保持自己的宗旨与作风。况且我提倡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过孔子，我们应当承认中共在历史上的成就，但不接受共产主

义，更不能不维护自己的特别立场，读者谅之。

〈关汉葦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夸的嫌疑。“旧业已随征战尽”的大标题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旧作，也难免避免批评。然则我既已早就说明我的历史观与个人的人身经验互为出入，中国历来的群众运动尚待将其积极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将自己年轻时参加这种群众运动之详细情形隐瞒的必要。何况文中还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级军官。在这卷首即介入缅甸战场之所见，则是树立本书风格，使读者体会我所说实践的意义，了解我研究历史时注重社会下层所产生决定性的力量之由来。虽说这几篇文字稚气在所不免，现在也不予更动，除了部队番号已据实提出之外，其他全部复制如当日之刊载。

至于我有机会写这样的文字，则因一九四四年驻印军反攻缅甸时，我和另一位上尉参谋朱景熊（亦即〈八月十四日〉中的“小朱”，现在台北）同任前线观察员，多时随第一线部队出入前方，每日以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的名义以密码向重庆统帅部提出报告。〈拉班追击战〉是我任务之开始。前线观察员行动自由，不受部队长约束。朱景熊和我的报告，也无人检阅，径送电台，但具副本向驻雷多的副总司令备案。只是我们成为了高级将领的耳目，必须实践的对报告负责。也真料不到这一年多的工作，构成了我几十年后作历史从业员一种极严谨的训练。

当然的，战场上的艰苦与残酷不尽如这几篇能在战时大众刊物发表的轻松。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个阵亡的日兵，还如生前一样的坐在机关枪掩体之后，面上却黑黝着的盖满了苍蝇。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烧透过的阵地。还有几具直立在战壕内的尸体虽然脸上已烧得一团红黑，却仍因着眼眶与下颏留下的痕迹显示着最后一分钟吁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敌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战车，也真想不到，弹速如是之大，它们在一吋半的

装甲上所戳洞，竟像戳洞机在纸上所戳圆周的完整，圆洞全部光滑，内外的边缘也毫无残留多余的钢铁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着一个圆洞的内壁旋转，想像着当时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装甲兵称他们的战车为“铁棺材”，之由来。不过这已与主题越说越远。除了在“为什么威尼斯”流露了一些个人的情绪之外，这一切只能留在其他的地方发表了（假使还有此需要的话）。

阙德基先生所作“也谈猛将阙汉骞”以传统传记手法写出，和“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着眼于当日军令、军训、军需都未上轨道时各人挣扎的情形不同，但是两人能互相印证，也更正作者若干错误，兹征得阙先生同意附载并列，谨此向阙先生致谢。

最后我感谢各刊物的编辑先生小姐们，也珍重的体念到她们和她们让我抽出各篇出专集的好意。

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日于纽普兹
十月十六日校排后补订

目 录

玉垒浮云

——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1)

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1)

拉班追击战…………… (2)

八月十四日…………… (20)

这种敌人…………… (42)

新腊戌之役…………… (54)

古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66)

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 (67)

忆田汉…………… (75)

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85)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 (100)

〈附录〉也谈猛将阙汉骞 阙德基…………… (121)

费公诲我 我负费公…………… (125)

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 (139)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140)

赫逊河畔纵谈主义…………… (147)

摩天楼下的刍议…………… (152)

怎样读历史…………… (160)

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 (164)